

目 录

绥阳县概况·····	喻忠林、唐毅安(1)
绥阳县近百余年来历史初探·····	陈兴仲(9)
近百年来绥阳几项工商业剖析·····	三裔彬(39)
漫谈鸦片危害百余年·····	罗悦明(66)
话旺草近百年来几项土特产品的沧桑·····	杨 林(69)
解放前后绥阳县的交通运输状况·····	郭 荣(85)
绥阳县国营商业的起步和发展·····	刘嘉麟(91)
回顾芙蓉大队三十余年来的历程 ·····	大队支书任志明口述·杨林笔录(107)
郑场特产——梨·梨膏·柿饼·····	王沐春(118)
温泉区二十年水稻良种推广概况·····	李文翰 屈义权(123)
让水沧桑二十年·····	董绍兴(130)
让水的今昔·····	罗 谏(132)
后水河的变迁·····	董绍兴(138)
芙蓉江水利工程·····	旺草水利站提供资料 杨林整理(140)
万里水库·····	王沐春(142)

洋川河畔的战火

——吴元彪反清攻占绥阳之役

……………历史故事·杜世忠(144)

绥阳县近五百年来的自然灾害……………县气象站(161)

封面设计：冯承章题字 刘家验画

责任编辑：陈兴仲 张为忠 卜宗学

校 对：刘家验

绥阳县概况

喻忠林 唐毅安

绥阳县位于贵州高原北部，大娄山山脉中段。东部与湄潭县接壤，南部毗邻遵义县，西部连接桐梓县，北部紧靠正安县。全县地理范围跨越东经 $106^{\circ}57'$ — $107^{\circ}3'$ ，北纬 $27^{\circ}49'$ 至 $28^{\circ}29'$ 之间。总面积2564.5平方公里，东西宽56公里，南北长74公里。大娄山山脉的余脉由西北蜿蜒而入，伸向东南面，遍布全县。县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多属高原丘陵地带。主峰天门山，位于县北太白区太白公社，为县内最高点，海拔1802米（南天门）。最低处为太白区野茶公社麻塘村，海拔635米。全县地势平均海拔1000米—1100米左右。位于西北部的黄桷、宽阔、太白、温泉等地群峰耸立，山大坡多，峰岭相连，峡长谷深，沟谷交错，有古木参天的森林和绵延不断的林荫地带，有名贵药材天麻，有经济林木如桐、椿、漆、茶等。宽阔水天然林区，有大量的珙桐（中国鸽子树）、水青树、毛冠鹿、林麝等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稀有动植物。位于东南部的洋川、郑汤、旺草、儒溪等地，地势较低，起伏连绵的丘陵、山岭，间夹有若干大小不同的山间盆地及宽谷，河流纵横，沃野连片。境内大小河流，分布全县。主流芙蓉江，发源于黄桷，由西向东，横贯中部地带，流经旺草、温泉两区，注入正安县到四川省汇入乌江；东北部的清

溪河，源出宽阡，由西向北，经太白区，流入正安县境内；南部的双龙河，汇聚洋川河和八甲沟之水，经儒溪、郑场、东出遵义县；后水河源出大桥公社，经高坊子公社流入遵义四面山与板桥河汇合。县境内河流皆属长江水系乌江支流上游，这些河流汇聚山涧溪水，川流全县。河水流量一般不太大，但水源丰富，有利于灌溉。河流上游各盆地和坝子，大部份为第四纪冲积土。河床两岸为近代冲积土。境内地形复杂。山地多属石灰石岩溶地。山区坡陡岩悬，峦岫争奇；丘陵起伏不断、绵亘延伸；谷地沟谷交错，峡长、谷深；平坝宽阔平坦，连绵数里。

绥阳有许多自然奇观，形成风景名胜。如离县城三公里多的“神仙洞”（雅名“碧霄古洞”），为天然石灰石溶洞而成，洞深数里，洞中乳石成林，有石笋、石柱、石钟、天锅、流泉、形状毕肖，为“绥阳外八景”中第一名景，真是“石盘滴滴能成露，玉柱婷婷可捍风”。旧《绥阳县志》上记载：“城北七里许，有望霄山，山麓有洞名碧霄，中空数里，万象天然，据传时有仙子出入，每岁春节，游人如市”。前人有诗赞该景：“望霄山麓辟洞天，玲珑怪石古因原，游人怕惹桃花笑，处处相逢尽谪仙”；城西五里有一清泉，泉水喷涌而上，细密如筛，形成串珠，人们称之为“雅泉喷珠”；城西北二十里的“仙人山”海拔1309.9米，双峰对峙，婷婷玉立，双峰间有一大石坪，呈现一天然棋局，故名“仙岭棋局”；城东四十余里的小关山下，透列三口水塘，水从头塘地中出，四时不涸，每日三潮，涨时水涌三、四尺，历时半时许水落，平静如常，美名“胜水三潮”；城南二十七里的“卧龙山”，为郑场八大庙宇中至今尚存寺庙。

山上林木葱郁，古木参天，环境清雅，每年春季，慕名而来的游观者，到此寻幽探奇；城西二十里的“瀑江九曲”，一带碧流，九曲回环，登山俯视，惹人赞美。绥阳县名胜古迹颇多，据旧《绥阳县志》记载有八十多处，比较著名的有“绥阳外八景”和“绥阳内八景”，但由于时代变迁，生态环境的变化，人为的破坏，多数景致已名存实亡了。

绥阳县有史可考，大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八四一年，唐虞时代属古梁州；战国时期归夜郎；秦汉时期为夜郎且兰地。隋朝大业七年（公元611年）置阳明郡，辖绥阳县和高富县，绥阳之名始此。唐武德四年（公元622年），在绥阳县地（并非现今绥阳县）置夷州，领13县，洋川县为其中一县。宋置绥阳县，属播州乐源郡，即现今绥阳县。明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在原地仍设置绥阳县，属遵义军民府，知县詹淑，清建县城，于绥山脚下，洋川河畔取绥山、洋河之意名绥阳县，至今已有三百八十多年历史。清时绥阳县辖金里、朗里、旺里、赵里共四里四十甲。民国时辖七个区。解放后辖八个区一个镇，属遵义地区行政公署管辖。

解放前尽管绥阳县自然条件较好，可是劳动人民长期遭受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特别是国民党统治时期，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使绥阳劳动人民终年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极端贫困的生活，经济、文化、交通都十分落后。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路过绥阳，开仓济贫，宣传革命道理，虽在绥阳五天后即挥师北上，但在绥阳人民心中却播下了反封建、反剥削、反压

迫的革命火种。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绥阳，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权，把绥阳人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绥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获得了新生。随即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型政权——绥阳县人民政府，辖全县7个区、19个乡、镇。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县里召开首届区书会议和县各界代表会议，布置了反霸工作，并在农村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通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等运动，彻底摧毁了封建统治，巩固了人民政权。一九五三年根据发展的需要，调整为8个区公所，85个乡人民政府。一九五五年四月九日在绥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选举成立“绥阳县人民委员会”。并将85个乡人民政府调为93个乡人民委员会。到一九五七年合并为53个乡人民委员会。全县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建立了1180个高级合作社。一九五八年成立8个农村人民公社，辖95个管理区。一九六二年恢复8个区，调整为60个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后，逐渐沿革为48个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四日，经“毛泽东思想绥阳县革命委员会筹委会”酝酿协商，宣告成立“绥阳县革命委员会”。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在绥阳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恢复绥阳县人民政府。现辖洋川、郑场、旺草、儒溪、黄槐、宽阡、太白、温泉8个区公所，1个镇，48个人民公社，353个生产大队，3956个生产队，共有5049个自然村。

绥阳县地处亚热带，终年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年平均温度在 15°C 左右，历年最高气温为 36.9°C

(1971年7月27日)，历年最低气温为零下6.9°C (1970年1月6日)；霜冻期短，无霜期长达246天——336天；雨量充沛，多年平均降雨量为1164毫米，雨季通常在5月——8月间；土地肥沃，适宜农作物生长；风向以东北偏东风为主，最大风力7级；灾害性天气主要有暴雨、秋风和冰雹。全县总面积2564平方公里，居住78871户，共390292人，绝大部份为汉族，只有太白、兴隆、金承、宽阁、联坝、大溪等公社有极少数苗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2人。

解放三十多年来，绥阳人民在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在政治、经济、文教卫生以及工农业生产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一九八一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达1,0063万元，比解放时的一九四九年增加2.8倍。

全县有耕地面积411954亩，占总面积的11%，其中田面积215664亩，土面积196290亩。洋川、郑场、旺草、儒溪等平坝地区盛产水稻、小麦、黄视、宽阁、太白、温泉等高山地区盛产玉米、杂粮及薯类作物。一九八一年全县粮食总产二亿二千三百一十九万斤，比一九四九年增长1.3倍，亩产从一九四九年的217斤提高到一九八一年的423斤。主要经济作物有油菜、辣椒、花生、烤烟、大豆等，尤以辣椒比较有名，以色鲜、肉厚、味辣之优点行销国内，还有部份可供出口。绥阳特产“空心面条”以色白、丝细、空心、味美，具有地方特色和风味，驰名省内外。绥阳不仅物产丰富，而且地下资源也很多，铁、煤、铅、锌、银等多种矿藏，现已开采的有煤炭。

据一九八二年的统计，全县有各级大小林场65个，林地面积46万亩，牧地16万亩，果林地1万亩，森林复盖率为13%。一九八一年种茶面积8017亩，总产茶叶259万斤。随着国家提高畜产品收购价格，进一步调动了广大社员群众发展畜牧业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丰富了市场供应，改善了人民生活。一九八一年底，大牲畜总头数59198头，生猪存栏数151921头。

全县水利电力建设事业，三十多年来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到一九八二年底止，共兴建了蓄水，引水，提水等各类水利工程635处，其中蓄水工程188处，总蓄水量为3723万方，最大蓄水工程为后水河水库，设计库容1590万方，100万方以上的水库，有杨柳水、宽阔水、水洋溪、万里、莲花洞、六井沟、木水坝、火秋坝等八座小（一）型水库；灌田千亩以上的引水工程6处，芙蓉江、观音岩、龙洞坎、头道河、联光、长白大沟；提灌站（包括电灌站、机灌站、水轮泵站）共387处。有效灌溉面积18万多亩，占田面积的86%，现建成农村小型水电站46个，装机47台、发电1570千瓦，县境内10千伏高压线路180公里，35千伏高压线4公里，低压线路近800公里。农村小电站和国家电网，使39个公社通了电，163个大队解决了照明及加工等问题，占全县大队数的47%，农村用电量达573万度。

解放前工业极为落后，基本上是张白纸。解放后，工业生产有了相应的发展，一九八二年有全民所有制企业10个，县区集体企业9个，街道工业8个，主要为水泥、煤炭、造纸、印刷、食品加工及酿酒等工业。社队企业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现有社队企业72个，一九八一年全县工业总产值1704万元。

全县农机具不断有所增加，一九八一年有各种型号机具4218台件，总动力达41326马力，其中有各种型号的汽车143辆，大中型拖拉机87台，手扶式拖拉机309台。机耕面积8534亩。

解放前只有一条遵义到绥阳全长四十一公里的毛坯子公路。解放后交通事业迅速发展，公路四通八达。现有各级大小公路长度达823公里，干线长68公里，48个公社都已通车，219个大队可供汽车通行，占全县大队数的62%，全县八个区每天都有农村公共汽车行驶，为城乡人民的生、活提供了方便，从根本上改变了人行困难和运输全靠肩挑背驮的落后面貌。

解放前绥阳的文教、卫生事业极为落后，仅有初中1所，小学12所。解放后，文教、卫生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九八二年，全县有高中4所，在校高中生1826人；中学33所，在校生11711人，中学教师632人；小学340所，在校小学生56874人，小学教师2151人。县里还办有县师范学校，县农校和县卫生进修学校各一所，为县培养专业人材。

解放前绥阳仅有一个县卫生院，医务人员5人，而且医疗设备十分简陋。一九八二年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就发展到63个，其中区级医院8所，公社卫生院（所）49个。还有县防疫站，县妇幼保健站和县麻疯病康复医院。全县有病床389张，医务人员562人。大部份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有赤脚医生287人，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缺医少药的

状况。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一九八二年，全县有43个广播站，36个公社建有广播站，占全县公社数的75%，331个生产大队有广播，使广大社员群众能及时听到党的方针政策。

近年来，城镇建设受到国家和各级政府的重视，城镇建设的投资有所增加。县城内主要街道进行了大规模的建设，原来“下雨遍地泥、天晴满天灰”的破烂街道，整修成宽阔平坦的水泥路面。安装了路灯，用上了自来水。城区内新的建筑物、大楼不断落成，城镇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基本上改变了过去绥阳城破烂不堪的“脏、乱、差”的状况，使城镇人民有了一个较为舒适、卫生的工作、生活、娱乐、休息的环境。

随着工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全县的工农业生产发展较快。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贯彻执行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国民经济总方针，放宽了农村经济政策，农村普遍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相应的发展。一九八〇年以来，社员收入有所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出现了“万元户”和“冒尖户”。不少的农民迁进新房，有的还添置了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等日常生活用品，有的还买了电视机、收录机等，农村出现了一片喜人的景象，农民生活蒸蒸日上。

绥阳县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自然条件较好，物产丰富。绥阳人民决心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把绥阳县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

绥阳县近百余年来历史初探

陈 兴 仲

一、明清两代的绥阳封建社会

绥阳县城营建于明朝万历二十九年，即公元一六〇一年，在讨平杨应龙之乱后的次年，迄今已有三百八十多年的历史。由于明朝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在江西遣送大批汉族人民来绥阳居住，相传当时是插标为业，耕种为生。所谓耕读传家，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当时的县令詹淑在未修县城前所住的衙门，不过是一个土墙隔成的小院落，座落在今北门城外县车队目前所住的地方。当时的面积不过百把平方米。农民出工，妇女们常将孩子委托给县令詹淑看管，故民间又称詹淑为“詹阿公”。可见当时的县令在初设置县的绥阳，与民众的关系是融洽亲近的，而县令詹淑对开辟边隅，也确实有一番爱国爱民的事业心。他到任后就劝民耕种，广植桑麻。继后的县令母扬祖又进一步鼓励耕织，发展生产。母在任内的利民条约中规定：“绥邑遍地有桑，而民间饲蚕者少，不知丝之为利无穷，百日即见效验。嗣后，地广人多者，可种二百株，多种者更好；地狭人少者，可种五十株，减其数者查处。”又规定：“男人耕种贸易，固有常业；妇女井臼之外，岂可袖手偷安，务要纺绩织纴以作家业。本县城内

有室者九百户，附郭有室者七百户，不论绅士民军家制纺车一架，人多二架。一月之内所出绵纱若干，本县沿门查点，三月以来，已有效验。为此通行四里（指金里、旺里、朗里、赵里，即今的八个区），一体通行。”可见这位县令积极鼓励提倡，并督促城乡人民积极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了，把农工商三业寓于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之中，具体到绥阳县来说，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了。

康熙年间，我县建常平仓于县衙大堂左右共六十四间，到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已积谷一千九百七十六石，到道光十九年（公元一八三九年）已增至二千四百三十石。据《绥阳县志》（民国十七年编纂，下均指此，不再注）。食货篇记载：“当日（指道光时期）户籍现虽无册可稽，然据耆旧传闻较之嘉庆初年略增三倍，可云盛也。”这一点又证明人口的增殖，为绥阳农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道光十九年，绥阳有二万一千八百八十户，男女大小共六万二千九百二十三人。

在蚕桑方面，绥阳自乾隆七年（公元一七四二年）由山东省历城县引进梅茧蚕种，翌年会报民间获茧八百万……

“纺织之声相闻，槲树林荫迷道，邻叟村媪相遇，惟絮话春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织之善否？”可见绥阳由明代的蚕桑饲养的传统丝蚕业之外，又引进新的蚕种，而当时的绥阳已成为生产家蚕与山蚕的主要基地之一了。

绥阳农村的传统手工业，还有留纸业。《贵州通志》载：“绵纸出绥阳为佳”、“白腻坚绵，更胜止溪，极佳者贩入蜀中，次之卖之本郡。”水纸专用水竹制成，“惟绥阳专利，其上者曰：厚水纸。”“草纸，用竹草制成，以绥阳茅垭制者为上。”还有绥阳手工盐水面，在十九世纪五十年

代即作为贡品，呈献咸丰皇帝，故又称为贡面，远近驰名。

关于文教事业方面，绥阳可谓源远流长。远在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汉桓帝时期，就有尹珍于旺草设讲堂的传说。到明詹淑修旺草公署，掘地得碑，故石而为之铭曰：“矫矫尹氏，生于邈荒，不囿于地，游学北方，归而设教，爰有此堂。我新其宇，其道重光，矫矫尹氏，山高水长。”詹淑又于明万历三二年（公元一六〇四年）修建文庙，提倡尊孔读经。明万历四十年（公元一六一二年）县令冯士奇提倡诗书礼乐之教，还留下《绥邑建学碑记》、《重修儒溪书院碑记》，詹淑亦有《儒溪书院存疑碑记》。存疑者，该院是否因以柳易播，柳（指柳宗元）于乾符三年（公元八七六年）入播修此书院而存疑也。记中说：“……世传如此，似非无因，遂捐资补葺旧宇，择其近院田地三十亩，授元（注）为业，并量免其杂差，俾世守祠祀无斁，寄以疑存祀，不容以曠废祀也。”文中还说：“昔刘梦得、柳子厚、李太白俱以永王璘坐罪，自贬夜郎，今播志有怀白堂，唐年谱又谓，白流夜郎即半道承恩放还，是白未入播也，而何以又有怀白堂也？堂在正安乐源乡与县属长嵌相咫尺，距夜郎几三百里，岂半道承恩即此地耶？”到了康熙二年（公元一六六三年）“绥有举人之始”；康熙八年始建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学署，并置训导一员；康熙十一年（公元一六七二年）“考取拔贡，为有拔贡之始。”康熙四三年（公元一七〇二年）、“训导周公辅到任，置教谕一员。遵义知府王元弼详请遵义府专设考棚，咨部报准，试者始免跋涉之苦。”到

注：“元”指文中“有耆年孟元者，公之后也。

世传公遗帖昔有见者，今无存矣”。

了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陈中荣中进士,为绥阳清朝一代有进士之始。雍正八年(公元一七三〇年)“知县唐椿就前县令詹淑所设义学,改建洋川书院。”乾隆三十年(公元一七六五年)议准遵义府学额二十名,绥阳县三名。乾隆三十九年(公元一七七四年)创设郑场义学,以斗庵为修室。道光三十年(公元一八五〇年)知县沈西序置宾兴膏火田种。(以上均见《绥阳县志卷九大事记》所载)。可见明清两代封建王朝为了培养封建统治的文武人材,是很重视教育的。

那么,绥阳在鸦片战争以前的政治经济和文教事业等究竟是个甚么状况呢?县志食货篇中这么说:“厥惟道光末年,会际升平,国家无事,士乐诗书,农安耕凿,商贾辐辏,工艺毕兴”。笔者认为道光末年这个“末”字有误,实际上道光二十年(庚子)因鸦片战争而著名的庚子赔款,是震动全国和绥阳的大事件,怎么能说“国家无事”呢?显然这个“末”字应该是道光初年比较恰当,庚子年就是公元一八四〇年,即鸦片战争开始的一年到一八四二年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史学家一致认定近代史就从这年开始,而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渐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了。所以笔者将上述那段话,把“末”字改为初字,才是绥阳当时封建社会的基本情况。

二、绥阳封建社会是怎样蜕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从天主教侵入绥阳谈起。天主教侵入绥阳县境,是从一七七四年开始的。他们是在雍正、乾隆年间严禁天主教时期悄悄从四川教区侵入我县的边远区(即宽阁区)的白茨坪,逾十年又由白茨坪侵入黄桷

区，特别是黄鱼江巨族王、徐二姓的入教，王柏堂昆仲全家二十余口均受洗入教，在我县富户人家全家入教中开了先例。这就是外来帝国主义势力与本地的封建势力相勾结的开端。对此绝不能小看，一向尊孔读经的富户绅士突然信仰起天主耶稣来了，这是有其政治、经济的特殊关系的。从社会意识和阶级性来看，徐王二姓的受洗入教，象征着封建社会思想意识的崩溃和解体，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思想意识在绥阳城乡逐步取而代之。又十年，天主教便深入到我县的中心地区了，同时反洋教的群众运动也开始兴起，在绥阳县历史上曾发生过四次斗争。第一次斗争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正当两次鸦片战争的中间时期发生的。这次斗争是全国性的，由于法帝国主义传教士的飞扬跋扈，激起了各省地方官和人民群众的义愤，以“皇帝未准公开传教念经”为理由，绥阳县和全国许多地方一样，发生了打教堂、杀神甫、捉教民的行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被迫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和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使中国又一次大量丧失领土主权，天主教取得了在华传教的更多特权，清政府被迫赔偿所谓教案事件的白银若干万两。这笔沉重的负担，自然又落在劳动人民身上，国内的阶级斗争矛盾也就更加尖锐化了。后来，满清政府“宁赠友邦，不给家奴”的政策，更激起了广大民众的愤恨。

一八三四年，法国贝神甫将经堂迁入县城内羊子市，由于他强占民房田地并施以暴行，激起绥阳人民的公愤，绥阳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发起了反洋教运动，打经堂、抓神甫、捉教友，打击了反动教会势力的嚣张气焰。继这次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后，一八五四年，绥阳县农民武装反对

封建势力的革命运动又兴起来了。地主阶级崇洋媚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思想，在县志中有所表现，如在县志营建篇教务志略一文中，居然以诬蔑的腔调说：“光绪中叶，地方人民，少见多疑，民教时起事端，屡酿教案”。崇洋媚外派既然已作了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天主教徒，当然就看不见帝国主义者实行宗教侵略的狼子野心，而完全责怪“地方人民，少见多疑”了。

绥阳封建社会蜕化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内部原因是什么呢？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各级政权机关的贪污腐化，已严重地阻碍着生产的发展，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的桎梏，阶级矛盾日益激化。《绥阳县志》食货、田赋篇记载（以下均据此，不另注）：“自道光九年（公元一八二九年）县令陈整到任以后，后令守其遗规以窘民弋利者，十年来而乱作矣！”那么县令陈整的遗规是什么呢。一是违犯国例，往常老百姓完粮按平斛响括收纳入仓，他改枵尖斗，而且老百姓要以两尖斗的稻谷才合过去的一平斗纳粮。这就是说，群众向国家完粮，自此开始，负担就增加了一倍。二是硬性规定九月初一日前所进之谷，方肯收纳，否则勒令折银。于是从县令到房书、到管仓斗级之徒，种种敲骨吸髓的手段就更多了。老百姓只得想方设法按其规定日期运粮来交，这就给验谷的粮丁一个贪污勒索的机会。企求当日完粮者，必须出钱买活粮丁，求他说个谷好，方可入仓。否则必定拖延时日，一拖往往就是一月两月，鼠耗盗窃，运粮人吃喝睡觉都苦不堪言，拖延的损失，还胜过折银之数。拿钱买活粮丁之后，还有第二道关口——簸谷。簸谷风车前后对出，把这道关口的粮丁，便将从二斗揆出之谷，夺归己有。然后是第三

关——量斗，量必尖斗。如完粮户争执，县令就假装正神，对粮丁大发脾气，骂粮丁不负责任，检查不认真，说此谷不干未簸净，责令将此谷逐出不收。这种打蛮子，吓好人的卑劣手段，使其余排队听候量斗的纳粮户，忍气吞声，任其尖斗行拐以免迁延时日；但是钙后还有第四关——交地盘谷，上粮多的四、五斗，上粮少的二、三斗。该志食货篇十二页载：“吁！衙门之内，上上下下皆成抢掠之场矣。”群众上粮折粮又怎样呢？县令重价勒折，不肯照市，大约一岁折谷之银，须费三岁纳仓之谷，方可了结。老百姓还能够活命么？！该志十二页载：“若秋收后始卖新谷以折秋米者，必费至纳仓五季之谷，方可以折一季之米，是一岁费数岁之供也。”后来的县令守其遗规，以饱私囊，到了道光二十三年（公元一八四三年）毕楚瑜任内，比陈整时期稼石四斗上京石一石则涨了一倍多，必须稼石九斗方可上京石一石。道光二十八年（公元一八四八年）解元许鸿儒等人以书吏丁粮午弊，控请提究，反遭缙绅之灾，这不是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时候了么？

法国帝国主义天主教的侵入这个外因和满清封建王朝的贪官污吏残酷地剥削压迫绥阳人民这个内因相结合，成为绥阳人民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严重对立面，这就是绥阳近现代史的客观实际过程。

三、咸同时期的绥阳农民武装斗争

咸丰四年九月（公元一八五四年九月），绥阳、桐梓、正安的农民武装起义爆发了。桐梓以杨隆喜为首的农民武装，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帜，提出“讲仁讲义”的口号，绥阳以赵帽顶为首的立三义堂起而响应，他们密切配合，